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1.007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

李世坤¹, 赵慧峰²

(1.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 130000; 2.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因为日、伪军与国民党政府的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特别是1941年之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劳动力、牲畜与农具都出现短缺,在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当地农民的生产与革命积极性也遭遇挫败。为激活生产,破解困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按家计划”,在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思想动员的前提下,通过组织规划和典型示范等举措,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劳动合作,在互助中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不仅使农业产量得到提高,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且激发了生产热情,支援了抗日战争,并在这个过程中锤炼了根据地军民应对困难、坚持斗争的勇气和意志,从而成为延安精神的另一个样本。其劳动互助的相关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家计划”;劳动互助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1-0048-07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进行生产自救,各根据地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是大生产运动中组织民众发展生产的具体形式。所谓“按家计划”,就是以村为单位,在全村生产计划制定好之后,村干部与劳动模范要积极帮助广大民众制定家庭生产计划,“就是要使全家男女老幼都能参加生产,保证没有一个人(婴儿除外)吃闲饭”^[1],以计划推动生产的落实。“按家计划”的劳动内容包括农业生产、副业收入、手工业生产以及运输贩货等各个方面^[1],目的是通过全面的计划、安排对根据地的生产尽可能地予以具体布署和落实,以保障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提高生产水

平,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劳动互助是提倡劳动过程中的交互、合作,在“按家计划”对生产任务进行落实的同时,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助力劳动成果的最大化。“按家计划”和劳动互助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按家”是尊重中国农业生产千百年来都是一家一户个体经营的历史现状,“计划”和劳动互助则是针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时代任务对生产进行的主观干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对根据地建设的发力以及以生产支持抗战的积极作为。“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劳动互助运动以“按家计划”为基础,而“按家计划”不是空洞泛化的,必须通过劳动互助运动得到落实。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劳动互助运动,学界关注较早,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对于山

收稿日期:2022-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活动项目“传承与创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921—2021)”(21STA011)

作者简介:李世坤(1996—),男,山东庆云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慧峰(1963—),女,山东临沂人,历史学硕士,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有关的研究论文有吴云峰的《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按户兴家”计划与劳动互助合作》(《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贺文乐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王俊斌的《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山西档案》2016年第2期)、孙启正的《组织起来:传统互助合作的改造问题——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俞小和的《调整与变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张俊峰的《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合作化运动的来源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梅德平的《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刘宏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河北学刊》1992年第3期)等。有关学位论文有杨艳红的《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互助研究》(延安大学,2014年)、侯春华的《论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郑州大学,2007年)、李玲玲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运动的历史考察》(吉林大学,2006年)等。

东抗日根据地的“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研究,成果相对少见^①。因此,本文拟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运用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基于《大众日报》刊发的相关文章与报道,尝试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的背景,梳理其发展过程,并对其成效进行总结。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为克服生产困难,调动民众生产与革命积极性,支援前线战争,致力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其实施的背景如下。

(一)敌后根据地自身发展的需要

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经济封锁与水灾旱灾频发,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892}因此,如何合理而高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抗日军民粮食供应,提高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危局的重要举措。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当时日伪重点关注的地区,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劳动力、耕畜与农具极为短缺,粮食减产明显,军民的后勤供给十分困难。“在鲁南,由于去年水旱灾交替,夏秋歉收,所以到处感到粮食极端缺乏。”^[3]并有敌人在经济上的破坏,“封锁游击区的经济活动,截运食粮,破坏法币滥发伪钞等等”^[4]。且“日军在山东的这种残酷扫荡,几乎遍及山东各地,时间也持续不断”^[5]。1940年秋季,“敌人对沂蒙山区的扫荡,被烧毁抢掠的粮食达数百万斤”^[3]。与此同时,汉奸还通过舆论攻势,到处叫嚣“中国抗战失败了”“百姓要想活命必须下关东”^[6],通过种种手段来离间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关系。此外,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抗战进步力量,不断制造摩擦,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投降派刘桂棠为例,他在费北各地大肆制造“敌寇将大举扫荡临淄公路以北地区”的谣言,欺骗群众进行财物转移,并趁机进行抢掠,“只耕牛即被牵去两千余头”^[7]。为了突破

困境,中共山东分局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自救和大生产运动,决定发动劳动、互助的优良传统,实行“有组织的集体生产方式,包括各种生产小组与劳动力、农具、种籽、耕牛等调剂配备”。并提出“应发动每个群众参加到这一组织中,以发挥全部生产效能,克服春耕中各种困难”^{[8]162}。1943年10月10日《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央十月一日指示的决定》明确指出:“认真的开展工作,尤其在群众中发动热烈的讨论,以农业为主,以家庭手工业为辅,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9]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抗战形势的需要。

(二)调动农民生产与革命积极性的需要

由于长期战乱,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农村经济遭受破坏,导致农民生活十分困难,许多农民甚至食不果腹,在最严重的地区,“人民只得吃糠树皮充饥,有时连求吃糠树皮亦不可得”^[10]。农业生产离不开劳动力,而某些地区因为大批壮丁参战,劳动力也大为减少。加之贫苦农民土地占有严重不足,以莒南县筵宾、大店、沟头三区为例,“地主仅有6.51%的户数,即占有了53.82%的土地。而其余93.52%的户数,却只占有土地的46.18%”^{[11]5},农民看不到自身的力量,“不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就是想逃荒下关东”^[12]。正如当时的舆论所言:“人民生活若不能得到适当的改善,我们即无由来有效的激发人民参加抗战与援助抗战的热情。”^[13]因此,如何破解旧的生产方式和思维观念,调动农民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发展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做过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指出:“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14]911}这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如何调动农民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指明了前进方向。1943年10月15日《山东

^①有关的研究论文有刘大可的《山东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东岳论丛》1991年第3期)、魏本权的《革命与互助: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动员与劳动互助》(《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等。有关学位论文有周婷婷的《20世纪上半期山东乡村互助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等。

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半年农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加强冬耕春耕的领导，及早布置，深入动员，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抗属及寡孤贫民）。普遍组织劳动互助，调剂人力牛力（参照当地习惯，注意互相帮助）。”^{[15]44} 意图通过“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来解决劳力、牲畜与农具等生产条件不足的困难，并使得抗属、民兵与贫困群众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进而激发互助与帮耕之主动性和积极性，将拥政拥军、自卫动员与发展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这一思路是符合逻辑的，以博兴县三里庄为例，在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之后，当地农民切实体会到劳动互助的好处，党的号召有了更大的感召力，广大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全村报名参军的有42名，在全县大参军工作中名列第一”^{[16]92}。可见，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就是为了将根据地广大民众组织起来，调动广大民众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有效调配各种资源，进而节约劳动力，有力地支援前线战争。

（三）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需要

毛泽东曾言：“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7]931}“高度的增加生产，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掀起生产建设热潮是与粉碎敌人阴谋，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不能分开的。”^[18]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19]679}“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发现根据地旧有的互助合作形式与苏联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有共通之处，可以加以利用。”^[20]为此，“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与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采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原则下，把一切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与完全必要的”^[21]。1941年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开展的《抗战第五年的山东十项建设运动》更明确提出，要“建立自给自足供给后方的经济建设

工作”，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财政供给政策”^{[22]158-159}。可见，通过实行按户制定计划的方法，开展劳动互助，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逐渐走上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化道路，进而推动建立经济上独立平等又互相合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当时实行“按家计划”和劳动互助的动机之一。

二、宣传先行，组织保障，典型示范

为了有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落实“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的实施，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劳动互助运动与“按家计划”统筹进行。

（一）宣传与思想动员先行

宣传工作是进行革命运动的重要手段，在实行“按家计划”和劳动互助的过程中，宣传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有效宣传与思想动员说明“按家计划”的好处与意义，可以使广大民众明白这一运动不是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分外差事”，而是关系到个体生产效果和整个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即“加强干部劳动思想与生产政策的教育，是开展生产运动的枢纽”^[23]。正如1941年4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开展合作事业的指示》所指出：“不得忽视宣传或宣传不深入，即命令式的着手组织，致使群众盲目服从。”^[24]因此，山东各地以村为单位，通过会议宣讲和个别动员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组织、动员，说明为什么要作计划，如何制订生产计划，逐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滨海、胶东都在冬末春初召开了生产展览会、农业座谈会，宣传生产政策”，通过介绍陕甘宁边区与山东各地的典型经验，使村干部了解“按家计划”的重要性，同时，“培养了一些劳动模范，组织了少数劳动互助”^{[25]378}。在沂源县桃花坪村，该村村干部在上级的领导下，为推行“按家计划”，“在冬学和识字班里，进行了连续的思想动员；并把村干部、积极分子们检讨和研究的结果，利用这些场合，展开群众性的讨论”^[26]。1943年10月，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黎玉“亲自下乡调查，帮助农民做生产计划，在滨海劳动模范大会上亲自主持生产座谈，听取群众经验”^{[25]378}。在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通过有效的宣传与思想动员，使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力推动了“按家计划”与劳

动互助运动的顺利进行。

(二) 组织规划

“宣传动员工作作的好,工作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但也仅仅是完成了一半——继之就须用集体的组织的力量开展工作。”^[27]个体经营的无序化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计划必不可少。在制定生产计划的过程中,有全村的计划而没有组和家的计划来保证,也是不行的,“按家计划”的意义正在于此。194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普遍的推动生产计划,以按家计划与全县全区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首先帮助支部积极分子与农会积极分子,根据其生产力的条件制定按家计划,再推动他们去影响与帮助别人。同时全县全区的生产计划是依照对自己地区的人口、地亩、生产力的调查,依照平均产量应要求增产粮食若干?(不要过高,以平均五斤至七斤为准)组织劳动互助若干?按家计划若干?扩大耕地面积若干?”^[23]因此,根据地政府要求村干部、积极分子必须深入群众,确保“按家计划”在群众中得到普遍推广。在海阳榆林涧,“村中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半月召开一次小组长联席会,报告各组生产情形,讨论各组发生的问题,今春春耕以来已经开了三次小组长联席会,现在全村每户和每个小组的生产计划都做了”^{[25]388}。沂蒙地区也不例外,艾山区X庄,“全庄已有四十九户订出生产计划,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六,四十五家正建立家庭会议,定期检查计划,推动全家生产。另外各家计划,锄地四遍到五遍”^[28]。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12月,“根据滨海、胶东、鲁南、鲁中,订兴家计划三一八四六户”^{[25]372}。

“按家计划”制订好后,生产的组织落实也十分重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借用民间传统的生产互助形式,并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1942年10月5日,山东各县组织了代耕队、互助队、耕牛队、搭犍队、互助小组等,开展春耕、秋耕工作。譬如,临沭大兴区某村成立了搭犍队,“现由四组发展到九组”,“参加者四十一户”^[29]。1944年1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发展生产保证军民衣食供给的布告》进一步指出:“组织与调剂劳动力与生产工作,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广泛组织搭犍队、换工

队(即变工队)、包工队(即扎工队),以提高劳动互助效率。”^{[15]253}“渤海专署和部分县区号召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同时建立了基点村工作,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办法,通过基点村吸收经验,领导各县区生产工作,临时纠正偏向,提高并巩固了互助组织,并且初步摸到了劳动组织发展规律。”^{[25]379}“全省至1945年共组织92644个组,1017140人,其中鲁中区23153组,198487人,占农村人口数的5%;鲁南区8571组,53568人,占农村人口数的2.2%;滨海区14771组,162421人,占农村人口数的4.6%;胶东区43944组,559362人,占农村人口数的14%;渤海区2205组,42302人。”^{[30]303}

(三) 发挥党员与劳模的带头作用

由于根据地民众较多,加之战争与灾荒的影响,每个家庭的实际状况都有所不同,对党的生产政策理解也有差异,因此,“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实行的,为此,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尝试。关于“按家计划”,是“先从积极党员和模范干部订起,不强调一般都订,从家里的各种具体条件出发,有重点的提出要求,不要主观的要求太高,计划内容要根据全年生产过程定出步骤”^[31]。模范干部与党员通过制订本家的生产计划,掌握了订立生产计划的方法,通过实际行动去影响推动群众,有助于推动“按家计划”的进一步推广。在鲁中临费沂边联县,县抗联委员、村长朱富贵“从去年九月,他就订出家庭生产计划来,贴在堂屋后墙上,全家人天天数算着:‘完成多少了?’”,“今年他实行了家庭奖励,谁完成或超过计划,就给谁多做衣裳”,“他帮助大家订了计划,一算计,全村能腾出十一个织匠光织布……地还种的更从容,剩下的劳动力就去包工运盐”^[32]。朱富贵还积极帮助邻庄“成立了变工互助小组和合作社”,“把他庄变工组和合作社内的情形好处向大家介绍,动员大家组织起来,帮助积极分子郑令砖订出家庭生产计划”^[33]。

“劳动英雄对开展生产运动有极大的作用。”^[23]在莒南,“模范代表大会的第二天,郑信等便开始了自己的活动”,而且他不仅完成自己的开荒计划,还动员全村进行开荒,“郑信那组六个全劳动力,一天开了五亩多,造成全村最高纪录”;织布模范张世英,“回到家里,首先订出全家的纺织计划,自己的计划是每天织两尺大布,保证一尺布十一斤重,一天可以收入一百三四十元”;

王培苗、吴希英等人,“他们回到家里后,每人除订一年的计划外,每人都订出一月计划”^[34]。“在此种情形下,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与其潜在的从众心理不谋而合,进而使劳动英雄在农民群体内部产生示范效应。”^[35]总之,模范人物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家计划”和劳动互助运动中发挥了明显的示范作用。

三、取得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不仅使山东农民组织起来,克服了个体生产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对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对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农民生活

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将广大民众有效组织起来,进行科学分工,精耕细作,解决了人力、畜力、工具不足的困难,有效改善了传统生产关系的弊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增加了粮食总量与农民收入,使山东农村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以莒南为例,莒南兰墩官庄在劳动模范陈立敬的带领下,积极开展互助合作,“每亩地多施肥两车”,改良农作法,对土壤进行定期置换,使农作物产量得到显著提高,“总计全庄一一五〇亩中中地,共收标准粮(地瓜麦子棉花按市价折合在内)四一四一九四斤,比去年增产一一四六二七斤,超过应产量七万余斤,每亩实增产六十七斤还多,全庄达到了耕三余一”^[36]。粮食产量的增多,不仅使广大民众吃饱了饭,而且可以通过出售剩余粮食来发展副业,改善生活。如劳动模范王思义所在的村庄,“王同秀已由中农上升为富农,王玉方由赤贫上升为中农的生活,全家六口都穿上棉衣。全庄一年来有十一家贫农上升为中农”^[37]。

(二) 激发生产热情,支援了前线战争

推进“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使广大民众从个体经营开始转向集体生产,农民开始认识到变工互助的好处,增强了集体主义意识,不仅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也激发了大家的抗日热情,从而支援了前线战争。一是提供公粮支持。“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的推行使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渐趋恢复,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同时,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对之前

存在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此外,中共在征收公粮时始终坚持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兼顾的原则,深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农民纷纷主动交纳公粮。以沂蒙山区的李家庄为例,在劳动模范王对一的带领下,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很明白,这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给他们的好处”,纷纷主动上交公粮,“王对一自告奋勇多缴三十斤,贫农李学成应负担才十六斤,自动多缴二十斤,全庄多缴了一百五十多斤”^[38]。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山东各地上交公粮,“计胶东XXXXX,渤海三一二二万斤(缺冀鲁边),鲁中七五一一三万斤,鲁南三九三六万斤,渤海七〇〇〇万斤,如连冀鲁边,估计在三万万斤以上”^[39]¹³⁵。这些公粮使中共掌握的物质力量得以增强,为前线军队的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二是提供人力支持。随着劳动互助运动的推行,山东根据地对劳动力、农具、种籽、耕牛等进行合理调配,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节省出大量劳动力,在不影响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使得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可以腾出大量人力支援前线。如滨海地区赵吉利运盐队,“上月部队批到他庄三千五百斤高粱,村长正找不到人送,他们就自报奋勇送去”^[40]。在“准备反攻,参加主力”的号召下,广大青壮年纷纷踊跃参军,“莒南、莒中、临沭、沂中、赵钊各县,几天之内报名参加者都在千人以上。广饶县竟能有二千七百人参加主力,而广饶九区一个区即有一一〇六名之多”^[39]¹¹²。可见,“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对渡过战争时期困难,争取反封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三) 成为书写延安精神的另一个样板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铸就了辉煌的精神谱系,延安精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延安精神虽以地域为标识,但却并不只限于延安,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时期所谱写的精神,时间是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到1948年3月23日,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此地的13年时间里,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由内忧外患走向胜利,同时党的领导力量由弱到强、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其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守,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践

行,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倡,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形成,既有对党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以及长征精神的延续,也有对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各解放区精神的汇总。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当时与陕北根据地同样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同样需要用生产助力战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按家计划”和开展的劳动互助运动是对党中央自力更生、劳动自救号召的响应,其在这个过程中所实施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解放思想的大胆实践,同样是对延安精神的书写和印证。

(四) 积累实践经验,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借鉴

“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劳动互助运动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现实依据。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实践基础。二是劳动互助合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使得根据地广大民众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农民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互助、合作的意识逐渐增强,广大农民深刻认识到,只有开展互助合作,才能使生产力的效能得到充分利用,也才能实现劳动成果的最大化。同时,在“按家计划”和劳动互助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广大农民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出路,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三是劳动互助运动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原则与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时坚持的基本原则,即自愿两利、树立典型原则,经实践检验证明了其价值所在,深受广大民众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其及时凝练、总结,最终形成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与国家帮助原则,作为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则。此外,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推行“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运动时所采取的广泛宣传与思想动员的方法也在实践中证明了其成效,即通过广泛宣传与思想动员来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使得劳动互助运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都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低级向高级渐进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薛暮桥. 怎样帮助农民增加生产[N]. 大众日报, 1944-01-25(1).
- [2] 毛泽东.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M]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陈明. 一个紧急的战斗任务 克服春荒解决军民食[N]. 大众日报,1941-02-04(2).
- [4] 关于游击区的财政经济政策[N]. 大众日报, 1939-05-11(1).
- [5] 金冲及.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J]. 抗日战争研究,2017(1).
- [6] 李宗淮. 生产大队在沂蒙山上[N]. 大众日报, 1941-04-10(3).
- [7] 投降派破坏春耕罪不容诛 刘匪抢牛达两千头[N]. 大众日报,1941-04-01(1).
- [8]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 [9] 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央十月一日指示的决定[N]. 大众日报,1943-10-17(1).
- [10] 开展春荒救济运动[N]. 大众日报,1940-04-13(1).
- [11] 山东党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地区农村经济调查[M]. 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1989.
- [12] 战斗的动员起来 开展春耕运动[N]. 大众日报,1941-02-16(1).
- [13] 防止壮丁出口与改善人民生活[N]. 大众日报, 1939-05-19(1).
- [14] 毛泽东.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M]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 [16] 中共博兴县委农村工作部. 博兴农业合作化史料集[M]. 博兴:博兴县劳动技校印刷厂,1988.
- [17] 毛泽东. 组织起来[M]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加强生产掀起生产热潮[N]. 大众日报,1941-04-16(1).
- [19]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 孙启正. 组织起来:传统互助合作的改造问题——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2).
- [21]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

十大政策的指示[N]. 大众日报,1943-10-05(1).

[22]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23]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N]. 大众日报,1944-03-25(1).

[24]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开展合作事业的指示[N]. 大众日报,1941-04-28(4).

[25]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26] 冠西. 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N]. 大众日报,1943-12-29(2).

[27] 李竹如. 怎样开展秋收工作[N]. 大众日报,1941-08-10(4).

[28] 王克一变工组 耕地锄麦跑在头里:四十五个人一天耕完二百多亩地[N]. 大众日报,1944-05-11(4).

[29] 明,祥,森. 互助劳动增加生产 临沭成立“搭帮队”:应向变工方向发展[N]. 大众日报,1943-10-13(4).

[30] 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1949-1952)[M]. 济南: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1955.

[31] 欣鱼. 莒南县委在去年大生产中领导思想和作

风的检讨[N]. 大众日报,1945-03-21(4).

[32] 鲁宝琮. 朱富贵[N]. 大众日报,1944-07-01(5).

[33] 劳动模范朱富贵 帮助外庄组织变工:某某两庄也组织起来[N]. 大众日报,1944-05-23(1).

[34] 文菲. 郑信开会回家的第二天领导全村变工开荒:变工组、合作社等分头检讨整理[N]. 大众日报,1944-07-21(4).

[35] 贺文乐. 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36] 康英. 兰墩官庄兴办水利变歉年为丰收 五顷洼地增产二万五千斤:全村努力深耕细作开渠积肥达到耕三余一[N]. 大众日报,1945-12-09(1).

[37] 若望. 王思义那庄变工组是怎样增产的?[N]. 大众日报,1944-12-27(4).

[38] 包慧,郭兆南. 蒸蒸日上李家庄[N]. 大众日报,1944-07-01(8).

[39]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40] 唐克. 赵吉利运盐大队成立后 九十六户群众不挨饿:变工生产也很积极[N]. 大众日报,1944-04-27(2).

“Plan by Family” and Mutual Labor Movement i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LI Shikun¹, ZHAO Huife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ed a serious crisis because of the plunder of the Japanese, puppet troops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Especially after 1941,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labor, livestock and farm tools i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and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of local farmers were also frustrated. In order to activate production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the CPC led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nd carried out “Plan by Family”. On the premise of extensive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and through such measures as organizational plan, typical demonstration, farmers were organized to launch labor cooperation, everyone’s enthusiasm for labor was improved in mutual assistance, and labor efficiency was increased,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farmers’ lives, but also stimulated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supported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is process,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courage and will to cope with difficulties and to persevere in struggle were tempered, thus becoming another example of the Yan’an spirit.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mutual assistance of labor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Plan by Family”; mutual labor movement

(责任编辑 雪 箫)